

*Literary Perspective and
Drama Film*

Hu Xingliang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文学视阈
与戏剧电影

胡星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资助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英文标识简称 PAPD）

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南京大学 985 工程项目经费资助出版项目

*Literary Perspective and
Drama Film*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文学视阈 与戏剧电影

胡星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视阈与戏剧电影/胡星亮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中国新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02-010255-6

I. ①文… II. ①胡… III. ①戏剧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集②电影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集 IV. ①I20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8815号

责任编辑 付艳霞

装帧设计 陶 颖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55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9.5 插页2

版 次 2014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255-6

定 价 3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上编:文学研究

论《摩罗诗力说》与“五四”新文学	3
“在白话诗方面尽了开路先锋的责任” ——康白情的新诗和诗论	14
论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创作	23
陈白尘散文创作的审美特色	65

中编:戏剧研究

喜剧:寓严肃于嬉笑的人生批评	79
中国现代喜剧发展论纲	94
中国现代喜剧创作流派论纲	111
在狱中传递台湾现代戏剧精神 ——杨逵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剧坛的意义	131
戏剧的宗教信仰与审美沉思 ——论张晓风的话剧创作	147
宋春舫: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先驱者	165

下编:电影研究

关于电影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191
巴赞:摄影影像的本体论 ——电影纪实理论(一)	228

克拉考尔:物质现实的复原	
——电影纪实理论(二)	249
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本体观念的深化	270
论第二代导演的电影创造与历史地位	284
后记	300

上编:文学研究

论《摩罗诗力说》与“五四”新文学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一篇庄严宣言。但是，多年来人们忽略了这一点，仅有的几篇研究文章只是从鲁迅思想发展的角度来谈论它，至于它与鲁迅后来的文学活动，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很少有人提及。事实上，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和主将，鲁迅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深受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在日本留学时又获得了丰富的外国文学知识，为后来从事文艺运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在他早期有关文艺问题的代表性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可见其端倪。

1907年，距离“五四”新文学运动还有十多年时间，但是，青年鲁迅从现实的发展中深察到“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他感到并坚信中国将要有一次更新的文化运动。因此，他1906年从仙台医专退学后，就计划创办文学刊物，译介19世纪一些弱小民族的小说；而在《摩罗诗力说》中，他又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欧洲当时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流派，介绍了拜伦等摩罗诗人及其作品，深刻地阐述了关于文艺问题的见解。诚如周扬所说：“这正是旧民主主义新文化向新民主主义新文化转进的先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预示”^①。

^① 周扬：《精神界之战士》，《解放日报》，1941年8月12—14日。

在“荒寒”中呼唤“精神界之战士”进行 “第二维新”，以“破中国之萧条”

1907年的中国，如鲁迅所说，是一片“荒寒”的大地。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使中国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饥寒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一片黑暗；二十多年的维新运动虽然冲击了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但后者在中国仍然根深蒂固，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在其钳制下日益“精神沦亡”；当时的文化界又为垂死的封建思想意识及其孔门诗教所羁縻，辗转于保守主义的迷雾中不知醒悟。神州大地是何其凄凉、萧条！

是啊，1907年的中国，真似一潭“死海”。然而，青年鲁迅的心里并不平静。从进化论的思想出发，他指出：人世间是根本不存在什么平和的，在暂时的平和背后就隐藏着突变和破坏。他看到了正在运行着的地火。因此，他反对“卑懦俭嗇，退让畏葸”的奴才性格，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斗争，以“破中国之萧条”。

正如从译介的历史上，鲁迅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而进了日本仙台医专一样；从外国文学中，鲁迅又发现了文学与民族命运同兴衰的事实，遇到众所周知的看幻灯片的偶然契机，鲁迅便毅然弃医从文，要用文艺去改变国民精神，振兴中华民族。

那么，文艺的任务又是什么呢？鲁迅认为应当去反映人世间的斗争和冲突，唤醒昏睡中的人民大众，鼓舞他们向黑暗的社会反抗、斗争。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1906年鲁迅就曾有意识地选取并翻译了19世纪一些进步文艺作品，并于1909年编成《域外小说集》出版，希望作品中跳动着的“叫喊和反抗”的声音能引起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民的共鸣，以疗治国民精神的衰颓和民族的衰亡。而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又介绍了欧洲文学史上的摩罗诗人及其创作。

这是一些怎样的诗人呢？这些“撒旦”，尤其是拜伦，他们“立意
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他们“争天拒俗”，“不为
顺世和乐之音”；他们为了独立、自由和人道而英勇抗争，不战胜敌人
绝不停止战斗。这种摩罗精神使鲁迅深深感动。他们的作品“无不
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凡是摩罗诗作，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突出主人公的复仇、反抗、爱国的精神。

“求之华土，孰比之哉？”鲁迅指出，中国文学中，大多是歌功颂德
的庙堂文学，吟花赏月的山林文学，念旧怀古的复古文学，就是屈原，
虽“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写出了杰出的《离骚》等作品，
但其中也是“多芳菲凄恻之音”，终篇未见“反抗挑战”之声。中国要
兴起，要从委顿衰颓状态中振作起来，是多么需要这样的摩罗诗人和
作品啊！鲁迅深感在这“精神沦亡”的国度中“精神界之战士贵矣”。
他热切地盼望着中国出现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期望他们以这些
摩罗诗人为榜样，“超脱古范”，“举一切伪饰恶习，悉与荡涤”，在
黑暗的中国唱出“反抗挑战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并“致吾人
于善美刚健者”。正如从无声的大地看到了运行着的地火，从现实发
展中鲁迅看到了“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青年鲁迅正举起双手
迎接着新文学运动的到来！

而伟大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正是以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的、爱
国的精神响应了“先声”的召唤，开辟了一代新文学。鲁迅在此文
中对封建统治阶级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孔子学说的批判，鲁
迅所提出的反对封建旧文学的战斗口号，直接为“反对旧道德提倡新
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①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做了准备；
“五四”新文学运动及其作品所表现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的、爱国的
精神，又是与摩罗精神一脉相承的，与鲁迅当时的反抗黑暗的精神、
振兴中华的意念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真正介绍欧洲文艺思想的第一个人”， 复以自己的深刻见解，开新“文化之曙色”

“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更大规模上是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为基石之一的。鲁迅当时期待着中国有更多的“介绍新文化之士人”，而他自己就是杰出的先驱者。除了译介外国进步的文艺作品外，他还是“真正介绍欧洲文艺思想的第一个人”^①。

鲁迅对 19 世纪的欧洲文学有着丰富的修养和深刻的见解。时至今日，当我们再读《摩罗诗力说》时，我们便会惊奇地发现：“五四”新文学时期主要的文学思想，这时期文学运动中所要解决的一些文艺问题，青年鲁迅早在这里作了介绍或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声”，《摩罗诗力说》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文艺的目的性而言，鲁迅介绍了欧洲的两种文艺思想。

第一，“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思想。鲁迅十分赞赏英国文学评论家安诺德的“诗为人生评鹭”的观点。在《域外小说集·序》中，鲁迅就说过：“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地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他认识到文艺乃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反映，是人生真理的形象揭示；并且认识到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要去指导人生。他举例说：“故人若读鄂谟（Homeros）以降大文，则不徒近诗，且自与人生会，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此其效力，有教示意；既为教示，斯益人生；而其教复非常教，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彼实示之。”鲁迅是强调“有教示”、“益人生”的。他的弃医从文，要用文艺来改造国民精神、振兴中华民族的愿望，本身就包含着鲁迅“为人生”的文艺思想。鲁迅是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文学

^① 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1 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68 页。

事业与民族振兴事业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他一生始终是坚持这一文艺思想的。

第二,“不用之用”的文艺思想。鲁迅介绍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不必讳言,这里也表现出鲁迅早期文艺思想中某些“非功利”的观点。但这也是一种不可全盘否定的“不用之用”的文艺思想:“涵养人之神思”。鲁迅引用英国人道登举的例子:人们阅读好的文艺作品就如在大海中游泳,游毕,元气和体力都突然增加。而大海本身只是波起涛飞,没有思想感情,也不能传授给游泳者以教训或格言。文学亦如此,尽管世界上有增加知识的历史书籍,训诫人们的格言等等,但只有有了文学,人们才感到接近于满足。这就是说,人们在文学中也可以学到知识,文学也告诫人们如何生活等,并且文学这种作用是历史书籍、格言所不能代替的。

就文艺思潮而言,《摩罗诗力说》介绍了欧洲积极浪漫主义流派。鲁迅不惜笔墨详细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斯洛伐斯基、克拉辛斯基、裴多菲等摩罗诗人,这些诗人的性格特征及其作品的主要倾向,以及这一流派的特点和它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发展与影响。还值得一提的是,在论及俄国文学时,鲁迅以极其省俭而深刻的笔墨指出了不同于浪漫派的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的创作特点:“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这一点,鲁迅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很多现实主义作家都是深受其影响的。

以文学研究会诸现实主义作家为代表的“为人生而艺术”派和以早期创造社诸浪漫主义作家为代表的“为艺术而艺术”派,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两支劲旅,他们登上文坛,顿使“五四”新文学大放异彩。他们犹如汇成中国现代文学长河的两支奔腾、清新的溪流,溯流而上,不难发现《摩罗诗力说》这潺潺源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鲁迅介绍外国进步文学是针对中国腐

朽的传统封建文学的,期望它们能够有助于打破无声的中国那种令人窒息的沉寂,以之“推翻一切传统的重压的‘东方文化’的国故僵尸”^①。

青年鲁迅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看到了在民族文化传统中有“辉煌之旧有”,然而,由于封建统治者以“持人性情”的孔门诗教对中国文学“设范以囚之”,因此大都不可取。此论虽有失之偏颇之处,但却不无事实根据。鲁迅将这些腐朽的封建文学大致分为三类:“颂祝主人,悦媚豪右”的贵族文学;“心应虫鸟,情感林泉”的山林文学;“悲慨世事,感怀前贤”的复古文学。这些消极的、虚伪的封建文学是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我们要努力创造出符合今日“世界之思潮”的“新声”。

今日之“新声”该是怎样的文学?鲁迅指出:文学应该“有教示”、“益人生”。他认为文学既要反映生活,又要指导生活,能启发人们在生活中不断前进,而对于生活的不足之处则去改造它,使它变得更加美好;文学应该以“伟大壮丽之笔”,“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用先进的思想、高尚的情操去教育人,改造人;文学应该“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对“社会之伪善”要“多讽喻”,扫荡一切虚伪、腐败的社会陋习。这样的文学,“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力足以振人”,“使即于诚善美伟强力敢为之域”。

我们是否也可以将鲁迅的上述文艺思想归结为“三大主义”?试为之:

反对“颂祝主人,悦媚豪右”的贵族文学,提倡“刚健抗拒破坏挑战”的战斗文学;

反对“心应虫鸟,情感林泉”的山林文学,提倡“有教示”、“益人生”的写实文学;

反对“悲慨世事,感怀前贤”的复古文学,提倡“美善性情”、“崇

① 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页。

大思理”的革命文学。

一般都认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大主义”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反对封建文学的响亮口号,殊不知1907年,鲁迅就在此文中提出了比之更深刻、更具体的思想。仅从这一点来看,说《摩罗诗力说》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声”,也是不过分的。

此外,诸如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规律、文艺与民族和社会的关系、文艺的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等等,鲁迅都做了精辟的论述。在1907年,不能不说这是先觉者的声音。

从“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的作品中 探其“古源”,可见“隐曜即伏于内”

1918年,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人的心,在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发表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一系列小说,以及无数思想深刻、笔锋犀利、文辞优美的杂文,显示了“五四”新文学的实绩,代表了“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方向。

马克思曾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的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是因为成熟的形式不仅最能充分揭示事物的本质,而且还可以从中窥测到它以前萌芽的、低级的形态。这样,如果把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小说及其杂文、散文诗比作“人”,将他早期文章比作“猴”,那么从“人”身上看看他的进化发展,看看“人”与“猴”的关系,这对于了解“人”是更为有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比较一下《摩罗诗力说》与鲁迅某些小说、杂文和散文诗在思想和结构上的关系(因为鲁迅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他的作品显示了“五四”新文学的实绩,所以也可以从中看出它与“五四”新文学的密切关系),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其实,这样的比较早有先例。瞿秋白在论述当时社会落后的原因时就说过:“问题是在于当时中国‘亦颇思历举前有之耿光,特未能言,则姑曰左邻已奴,右邻且死,择亡国而较量之,冀自显其佳胜’,有了这种阿Q式的自譬自解,大家正在飘飘然的得意得很,所以始终是诸葛亮式的革命理论‘胜利’,而对于科学艺术的努力进取的呼声反而沉没了。”^①瞿秋白这篇序言鲁迅是极为赞赏的,这就是说,瞿秋白的这种比较的看法是符合鲁迅的思想实际的。广而言之,也就是说许多反映在鲁迅小说及后期作品中的深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已在《摩罗诗力说》等文中形成了它们的胚胎。

我们还是先看看瞿秋白引用过的这一段话:“益中国今日,亦颇思历举前有之耿光,特未能言,则姑曰左邻已奴,右邻且死,择亡国而较量之,冀自显其佳胜。”这种不敢正视现实而别设骗局的瞒和骗的精神胜利法,鲁迅后来在阿Q身上给予了严厉的批判。阿Q实际上是被人打了,但他有种种妙法来安慰自己:或者说算是被儿子打了,而自以为比人家高了一辈;或者说自己是虫豸,而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飘飘然以“第一个”的状元自比;或者是自己打自己两个嘴巴,而觉得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等等。总之,他胜利了,心满意足了。在杂文《论睁了眼看》中,鲁迅又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后,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②

“中落之胄,故家荒矣,则喋喋语人,谓厥祖在时,其为智慧式怒者何似,尝有閤宇崇楼,珠玉犬马,等显胜于凡人。有闻其言,孰不腾笑?”看了这一段,读者眼前就会浮现出夸耀先前的阔的阿Q形象,仿佛阿Q偏着头对人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种安于保守、自欺欺人地自我陶醉的精神胜利法是进行

① 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269页。

② 鲁迅:《论睁了眼看》,《语丝》第38期,1925年8月30日。

改革的大敌,鲁迅是非常痛心的。在同国粹派的斗争中,鲁迅又讽刺了以“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自负的阿Q式的国粹派:“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这就好像“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鲁迅感叹道:这样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①

1905年在课堂上看到的一群中国人麻木不仁地围着观看另一群中国人被杀头的“盛举”,不仅成为青年鲁迅终身从事文学事业的重要转折点,而且还一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记忆之中。在《呐喊·自序》中忆及此事,他还沉痛地写道:中国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早在《摩罗诗力说》中,他就指出:“无流血于众之目前者,其群祸矣;虽有而众不之视,或进而杀之,斯其为群,乃愈益祸而不可救也!”在这里,鲁迅指出了中国国民性的另一个方面:麻木、无知、落后。这一思想在小说《药》中揭示得淋漓尽致。革命者夏瑜为民族解放斗争而不幸入狱,管牢的阿义却要勒索他的钱财。没有,就恶狠狠地打了他两个嘴巴,大有“进而杀之”之势;而茶馆里的茶客竟以夏瑜被杀之事当作饭后茶余消遣的材料。听说阿义打夏瑜,夏瑜说他“可怜可怜”时,不但不理解,甚至于还要大骂夏瑜“发疯”;而华老栓竟又拿革命者的鲜血来给孩子看病。在《复仇》和《复仇》(其二)中,鲁迅对于群众的不觉悟,往往麻木地对待别人的不幸或牺牲,做无聊的旁观的看客,很痛心。同样的思想鲁迅在《阿Q正传》《示众》等篇中都做过揭示。直到1926年,鲁迅在写历史小说《铸剑》时,还描写了这样一幅画面:眉间尺在匆匆行走时突然被人提住一只脚而跌倒,“正压在一个干瘪脸的少年身上,他正怕剑尖伤了他,吃惊地起来看的时候,肋下就挨了很重的两拳”,爬起来之

^① 鲁迅:《随感录三十八》,《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

后,“干瘪脸的少年却还扭住了眉间尺的衣领,不肯放手,说被他压坏了贵重的丹田,必须保险,倘若不到八十岁便死掉了,就得抵命。闲人们又即刻围上来,呆看着,但谁也不开口;后来有人从旁笑骂了几句,却全是附和干瘪脸少年的……”

“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撓,……有人撓人或有人得撓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之出,必竭尽全力死之;有人撓我,或有能撓人者,为民大禁,其意在安生,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故性解之出,亦必竭尽全力死之”。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是这样的“性解”,他提出了与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见解:四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全是吃人的历史。他怒愤地揭示了封建制度和礼教的丑恶,憧憬着没有剥削、压迫的幸福、美好的未来。于是,大哥——封建势力的代表,皇帝不也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吗——就千方百计地要扼杀他;于是,民众——他们也是被压迫、被剥削者——就要全力扼杀他。这是一幅多么可怕的画图!

在1936年4月30日写的《〈出关〉的“关”》一文中,鲁迅说:“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三十年前”,正是鲁迅写《摩罗诗力说》的前夕。鲁迅看到了“不撓之治”将有使中国趋于灭亡的危险,因而奋笔批驳了提倡“不撓之治”的老子。他写道:“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撓人心;以不撓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治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其术善也。”有这样的“不撓之治”,百姓都形成了“槁木之心”,安分守己,不求上进,结果是“神质同堕”,这是有利于统治者的,可以让他们的封建社会“故态永存”。所以鲁迅一直反对提倡“不撓之治”的老子主义。一直到晚年,他还写了历史小说《出关》,把老子写成一事不做、徒做大言的空谈家,最后“毫不爱惜”地“送他出了关”^①。

至于《摩罗诗力说》中所介绍的作家对鲁迅后来创作的影响更

① 鲁迅:《〈出关〉的“关”》,《作家》月刊第1卷第2期,1936年5月。